

商代地理概論

郑杰祥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商代地理概论

郑杰祥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商代地理概论

郑杰祥 著

责任编辑 钟 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875×1270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86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册

ISBN7-5348-1313-1/K·398 定价 13.00 元

《商代地理概论》序

胡厚宣

郑杰祥同志,英年好学,颇有成就。早在1980年前后,我尝读其关于夏文化的几篇论著,及其选编《夏文化论文选集》一书的前言,颇觉他分析夏文化研究的前后过程并申述对于夏文化之论证,学术水平较高,深表赞赏。

最近又收读其《商代地理概论》一书打印稿,煌煌巨制,令人更为钦佩!

殷墟甲骨文,自从1899年被王懿荣开始辨认,1915年王国维首先写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后,80年来,考论商殷地理的论著,不下一二百篇,或考疆域地理,或考都城地理,或考农业地理,或考田猎地理,或考征伐地理,或考方国地理。卜辞所见地名亦多,从1939年曾毅公作《甲骨地名通检》,1958年岛邦男作《甲骨卜辞地名通检》,甲骨地名,所见逾千,迄今材料继续发表,更不只此数。

今杰祥同志《商代地理概论》一书,全面考论商代王畿和四方四土的诸多地理,并专题研讨了商代田猎、黄河故道及帝辛征伐人方的有关问题,洋洋大观,可谓盛矣!各篇内容,创发颇多,读之尤为可喜可敬!世之言商代地理者,其有取于斯乎!故为之序。

1993. 11. 28

序《商代地理概论》

高 明

研究商代地理是了解商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很受重视。如《史记·殷本纪》云：“自契至汤八迁”，唐张守节《正义》只能言其三：南亳、景亳和西亳。《史记》又云：汤至盘庚“乃五迁”。《正义》云：“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隰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有限，过去只能作些零星考证，均无定论。自清代末年以来，商代甲骨文陆续出土，就为研究商代地理，特别是研究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地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大抵从二十年代开始，王国维等一些学者就已注意到从卜辞中记载的地名，来探讨商代的地理。他仅据当时所能看到的一些材料，参照文献记载，对商王邦畿附近的八个地名的地望，作了详细的考证和具体说明。研究商代卜辞中的地名，关键在考察它们的地望，即具体所在的方位，王国维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后来郭沫若在王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商王田猎和出巡的卜辞所载计日干支与地名，按照商王每日所到达的地点，以其先后排列成序，统一考察它们的地望和范围；并依两地之间往返的日程，判断彼此间隔的距离，这就是郭氏创立的

利用卜辞的计日干支与地名间的内在系联，研究商代地理的方法，即所谓“干支地名系联法”。由于有了这种方法，则使商代地理这门艰深的学科，得到迅速的发展，如董作宾根据乙辛时代的卜辞，对商王征人方往返路程的研究（《殷历谱》），陈梦家对商代方国地理的研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李学勤对商王猎区的研究（《殷代地理简论》），钟柏生对商代农业地理的研究（《殷商卜辞地理论丛》）以及日本学者岛邦男对殷之方国与殷之地域的研究（《殷墟卜辞研究》），松丸道雄对田猎地理的研究（《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理》）等等。这些富有创见的专著，均对商代地理这门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杰祥氏的《商代地理概论》，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巨著。他博采众长，择善而取，集中各家精华于一书。更为可贵的是，他不拘泥于前人的论点，利用自己所长，对过去的立论取长补短，纠偏反正，创立新说。不惜用大量的资料与广泛的证据，以辨是非曲直，弃伪存真。郑氏撰写此书遵循四个步骤，一辨识卜辞地名文字，二构制地名网络，三运用文献考定地理，四利用考古发掘的商代遗址与出土遗物，考察其与商朝的地缘关系。在这四个研究步骤当中，最为重要，困难最多，而且是最普遍的问题是辨识地名文字。字识不准，尽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充分的参考资料，也无济于事。例如，田猎卜辞中代表地名的“𠂔”字，它同许多地名构成网络，彼此间隔只有一两日路程，显然是个较大的田猎区，过去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皆释为“噩”字，依据文献考定为古鄂地，位于安阳西南，即今之沁阳境内，郑氏首先纠正了“噩”字的误释，从于省吾释为“𠂔”字，据文献考证当为古濮水桑间之地，

则在安阳东南，即今之濮阳境内的桑村一带。1958年郭氏在重印《卜辞通纂》时，曾于序之眉批中写道：“噩字于省吾释丧，言卜辞‘丧众’屡见，又言‘大目丧明’，丧字无疑，其说可从。”可见郑氏的意见完全正确。再如，关于商王邦畿之内的大邑商’与‘天邑商’，两种称谓究竟是一地或是两地，学者看法不一。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商》与日人林泰辅《甲骨文地名考》皆主张大邑商即商之国都，即今之安阳市的小屯村。董作宾认为大邑商是殷之古都，乃今之河南商邱。陈梦家认为大邑商在商王的田猎区，即今之河南沁阳。在五期卜辞中还有名为“天邑商”者，董作宾谓有别于“大邑商”，因商王巡游在外随地设立行宫，皆可泛称为“天邑商”，无固定地区。陈梦家谓“天邑商”即指朝歌。李学勤谓“天邑商”是一相当大的区域，实指商代后期的王畿，等等，其说不一，意见颇为分歧。可是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天邑商”与“大邑商”是两个不同地域的名称。郑氏先从“大”与“天”两字的古形、古义和古人使用的先例说明它们的关系。然后利用卜辞自身的材料证明晚期出现的“天邑商”，就是“大邑商”，乃异名同地，皆为商王国都。从而澄清了过去的误会；同时还依据卜辞资料进一步证明王国维早已指出的大邑商与天邑商皆为安阳王都，正确不误。还如，邶、鄘、卫三地，商代甲骨文写作“𠂔”、“𠂔”“𠂔”。《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郑玄《诗谱》云：“自紂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关于三地之具体所在，学者看法不一。王国维据河北涿水出土北伯铜器，认为邶即古燕，地在今北京以南。陈梦家认为鄘为宋地，在今之河南商邱。郑氏根据卜辞及

《诗经》邶、鄘、卫三国国风所反映的内容与地理环境，考定三者皆在河、淇之间商代故墟的周围。他推测邶地当今河南汤阴东南，南距淇县朝歌镇 30 公里左右；鄘在新乡西南，北距朝歌镇 50 公里左右；卫原为朝歌东边一地名，周初由管叔驻守，平叛后封于康叔，康叔居朝歌故称卫康叔。

该书类似的考证，不胜枚数，这里仅举三例，足以说明作者考证之精博，态度之严谨，论证之详实，结论也较贴切。《商代地理概论》一书确实是当前研究商代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

众所周知，商代地理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资料多而繁杂，识字之困难，考证地望之艰巨，实令人望而生畏。研究这门学问，首先应具备高深的商代考古学和商代甲骨文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有精博的古代地理、历史文献，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学识修养。郑君在这方面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学术造诣颇深。他三十年如一日，一直从事先秦考古工作和商代甲骨文字的研究，并且发表过许多很有影响的论著。尤其是对商代地理的研究，其精辟的论断，独到的见解，令人折服。此书稿本我曾阅读多遍，受益良多。今郑君约我以个人的体会写一小序，余乃欣然命笔，序如上述。该书现已付梓，不久即可享于读者，唯阅读此书，尚知余言之不妄也。

1994. 6. 26

前 言

本书《商代地理概论》，实际上是一部主要运用卜辞资料研究商代后期地理的著作；至于商代前期地理，由于文献记载甚少，前人论述又多，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这里就暂付阙如，略而不论了。殷墟卜辞中记有大量的地名，它为研究商代后期地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些地名资料很早就为甲骨学者以及有关学者所重视，本世纪初，孙诒让在其所著《契文举例》中就单独列有《方国》一篇，收集了他所认为的 20 个卜辞地名。众所周知，《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甲骨学的专著，因此，该书《方国》篇的写就，可说是开创了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先河。一九一五年，王国维著《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这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殷墟卜辞地名的论文。王氏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在这里将卜辞所见二百余个地名中，对“其字大抵不可识者”，虽可认识却“罕见于古籍者”，虽见于古籍但又“距殷颇远，未敢定为一地”的大多数地名置而不论，特选出他自认为“皆在河南北千里之内”，就是说位于殷王畿之内及其附近的龚、孟、雍、亳、曹、杞、截、雇八个地名，对照后世文献记载，以考释其地望。这可说是他所提出的“二重证法”在卜辞地名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王氏的这个考释现在看来大部分依然是正确的，它迄今仍被学术界普遍地遵从。其后不久，日人林泰辅博士著《甲骨文地名考》，他沿用王国维的研

究方法,并且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对卜辞所见 117 个地名的地望结合后世文献记载加以考释,并且绘制出《龟甲兽骨地名图》以标出这些地名的所在位置,这是第一幅考释卜辞地名的示意地图。林泰辅氏于此文用力甚深,他认为卜辞中的某些地名虽然见于后世文献记载,但二者“必须悉断为同指一地,当太早计。”因此,他在这里只是把文献所记较多的一些与卜辞相同的地名,将其“自地理上观之,亦未见有矛盾点时,”才暂且定为卜辞地名的“假定之地,以供参考。”他并且认识到我国古代存在着“异地同名”现象,于是便试图将后世文献所记与卜辞同名的所有地名一一列出,意在与读者共同探索卜辞地名地望,他的这种严谨态度确实是令人钦佩的。但是虽然如此,他这种研究方法,即将卜辞中众多的地名孤立地抽出来,单纯地与后世文献相对照的方法,终究还是无法证明那就是卜辞中地名的地望,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准确地落实这众多的卜辞地名的地望。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即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推动卜辞地名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殷墟卜辞的大量出土和问世,卜辞中所见的地名也在不断地增多,这成批的卜辞地名群的出现,为寻求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卜辞地名中的地望提供了客观条件。郭沫若先生首先发现并利用这个客观条件开创出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首先根据卜辞地名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判定这些地名的大致范围,然后再结合文献记载来探讨这些地名的地望。利用卜辞地名之间内在联系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干支地名系联法”、“同版卜辞地名系联法”和“异版卜辞地名系联法”,其中以干支系联法为基础,如郭氏在其所著《卜辞通纂序》中举例

云：“辛丑卜：贞王田于丧（笔者按：此字原释作噩，于省吾释作桑，借作丧，郭氏后改从此说），往来无灾？弘吉。壬寅卜：贞王田雍，往来无灾？”商王于辛丑日贞问前往丧地田猎往返有无灾祸，占验结果是大吉。又于次日壬寅贞问前往雍地田猎有无灾祸。由是可知，卜辞丧、雍二地相距当在二日路程以内，二日时间限制着二地相距虽未必近在咫尺，但也决非远隔千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两日行程最多不过百公里左右，这就为我们判定丧、雍二地的大致距离提供出一个可信的依据。以此为基点，如果能在其他卜辞中发现与丧、雍二地有相近干支系联的地名，并且以此类推，继续发现许多有相近干支系联的地名，在这个前提之下，对照后世文献所记的同名且又在同一范围的地名，逐一考释其地望，从而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可信的卜辞地名网络。干支地名系联法把殷墟卜辞地名的研究建立在一种新的科学基础之上，它并且为研究商代区域地理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法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这是郭氏在学术上又一重大贡献，他揭开了殷墟卜辞地理研究史上新的一页。

四十年代中期，董作宾先生著《殷历谱》，该书充分运用了干支系联法，在这里他首次将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卜辞资料搜集起来并加以系统的整理，对此次征人方往返经过的地点按其所在干支时日进行系联，加以排列，考释其地望，并绘出此次征人方往返路线示意图以表示之，这是董氏在殷墟卜辞区域地理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

五十年代，学术界对殷墟卜辞地理的研究获得长足的进展。首先是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问世，该书在《方国地理》一章中，运用近 200 个卜辞地名资料，进行系联，考释其地

望,对商王朝后期的都邑、主要田猎区、诸部族方国的地望以及乙辛十年征人方的路线问题作了系统论述,这是第一部试图利用卜辞资料全面研究商代后期地理的著作。《方国地理》和该书其他各章一样既继承前人成果,又有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卜辞中的“天邑商”当在后世称作的朝歌,“中商”在河南省安阳市,而“大邑商”则位于沁阳田猎区。对卜辞中的“商”邑,他信从董作宾说,以为当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境;关于商王的田猎区,他发挥郭沫若一说,认为当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及其周围地区。他所考证的四十多个部族方国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认为多分布在今山西省的南部和东南部一带,这个意见也和郭沫若所说“殷人之敌在西北”,“南方无劲敌”(《卜辞通纂·征伐》)意见基本一致。对于商王所征伐的人方,陈氏也信从郭沫若、董作宾说,以为应是后世称作的淮夷,位于今淮河下游一带,但对于征人方的往返具体路线,又具有新的见解。最后他结论说:“自盘庚以来的殷代,商王国的主要范围在河南。”而到了“晚殷时代,商王国势力已逾太行山而西”。“乙辛时代,商王国一方面西逾太行,一方面南渡淮水而伐人方。”其势力已扩展到今山西省东部、安徽省和江苏省北部一带。另外,该书还有《政治区域》一章,本章是在《方国地理》的基础上,对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作了进一步地论述。他认为卜辞中的“大邑商”和“商”又“实指为一个范围的土地,它相当于后世所称作的王畿,而与“商”相对的“四土”则应是指王畿以外的四方领土。在“四土”之内除商王直属地之外,又封有若干侯、伯、侯、伯首领居住的地方也称之为“大邑”,一般的居民点卜辞中又单称作“邑”,“聚于大邑以外的若干小邑,在东者为东鄙,在西者为西鄙,而各有其田。这就是

卜辞所记“东鄙”和“西鄙”的含义。“四土”的边缘也就是商王国的边界，这里分布着一些相对独立的诸侯方国。它们拥有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受殷王国的统制，有交纳其农作物与代其出征的义务”，又“常受殷王的命令征伐方国。”在“四土”之外，即商王国的周围，又分布着某方、“二邦方”、“三邦方”和“四邦方”，它们对商王朝时附时叛，多数是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的状态。总之，陈氏通过对《方国地理》和《政治区域》的论述，试图运用卜辞资料为人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商代地理轮廓，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学术界对卜辞地名的研究正式步入于卜辞地理研究也即商代地理研究的新阶段。

继《殷墟卜辞综述》之后，日本岛邦男博士出版了他的《殷墟卜辞研究》，该书在《本论》第二篇中首列《殷的地域》和《殷的方国》两章，对商王朝后期的领土及其周围方国也进行了论述。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这两章是将其所见“卜辞的五百四十二个地名中，根据可以得知两地行程日数的一〇五个地名，来考定殷的地域。在此地域的四周，例如武丁时有二十二个敌国，武丁曾予以讨伐；尤其是帝乙十年征伐孟方，帝辛八年、十年的征伐夷方（按：即其他著作中所称作的人方），以及殷周间的关系，都加以特别精密的论证。”岛邦男氏在《殷的地域》一章中，首先认定安阳殷墟为商代王都，它在卜辞中称之为“兹邑”。而卜辞中的“商”地，他信从董作宾说，认为当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城。以此为基点，他把与商地有关联的六十六个地名加以系联，拟测其方位，从而构成殷“东南地区的地名”网络。接着他又以与商地有系联关系的丧地为基点，把与丧地有关联的十六个地名加以系联，拟测其方位，从而构成“殷东地域的地名”网络，这些卜辞地名大

多是商王田猎地,因此,他所说的“殷东地域”也就是商王的主要田猎区,这个意见和董作宾所说大体是一致的。对于商王朝西部的地名,他首先认定卜辞中的“洛”地,就是今陕西省渭水以北的洛水,以此为基点,他把与洛水有关系的七个地名加以系联,拟测其方位,从而构成他所称作的黄“河南的地名”路线图。另外,他又信从王襄一说,释裴为北,并且以此为基点,把与此地有关联的 23 个地名加以系联,拟测其方位,从而构成他所称作的“殷西地区的地名”网络。以上这四个区域的地名网络就是岛邦男氏所论述的“殷的地域”的大致内容。在《殷的方国》一章中,岛邦男对卜辞所见五十一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重点是论述了帝辛十年征夷方的问题。他在董作宾《帝辛日谱》的基础上,对此次征夷方行经的地名加以增补和修订,并绘制出《帝辛十祀征夷方历程》示意图以表示之。总之,岛邦男的论述多有新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在整个殷墟卜辞地理的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五十年代末,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出版,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殷墟卜辞地理的著作。全书共分《殷、商与商西猎区》、《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和《殷代多方》三章,以对《商西猎区》的论述为最详。该书在本章中纠正了郭沫若释田猎卜辞“衣逐”之衣为地名之衣的误释,但他仍然信从郭、陈二家之说,认为商王田猎区当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及其周围地区,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商王田猎区从东到西细分为凡、敦、孟、邵四区;又认为卜辞中的滴水应当就是后世的沁水,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在这里还首次提出了“商王田猎是有一定日期的”见解,认为“大体说来,在文丁以前,商王猎日以乙、戊、辛、壬为常,丁日为变;帝乙、帝辛时略予放宽,以乙、丁、戊、辛、壬为常,庚日为变。”这个见解也是

颇具创造性的。

这里还需要提出的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丁山先生出版了他的《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饶宗颐先生出版了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前书在其后编《殷商氏族方国志》中,对卜辞所见四十三个“氏族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后书则对与贞人有关的三百八十多个地名中的大部分地望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他们仍然采用与后世文献相对照的方法来考证卜辞地名的地望,但以其渊博的学识,旁征广引,其结论往往有独到之处,足以发人深省,因此,该书在殷墟卜辞地理研究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十年代初,日人松丸道雄先生著《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理》,这是第一部专门论述卜辞田猎地理的著作。作者从约三千片田猎卜辞中,统计出一百五十个田猎地名,按其所在的干支时日加以系联,以推测各田猎地之间的距离,并列表加以说明。最后,他试图通过对田猎地名的研究,进而分析、探讨商王国的国家结构,认为商王国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由此可见,该书虽为研究卜辞田猎地理,实际上也是一部研究商代历史地理的著作。

八十年代末,钟柏生先生著《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该书以论文集的形式对卜辞所记商王田游地理、商代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以及记事刻辞中的地名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各类地理后面又列有卜辞地名表以供参阅。钟氏在分类地理的基础上,着重在对地名地望的考证。在这方面他博采众长,又力求创新。如对商王田猎地的考证,他主要信从董作宾、岛邦男二家之说;而对雍地的考证,他则采用屈翼鹏说,认为当在《禹贡》“雍,沮会同”的

雍水沿岸,位于今河南省范县濮城镇以南。对于瀑地的考证,他采用裘锡圭说,以为就是春秋时代的暴地,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境;对于孟地的考证,他个人则认为应当就是春秋时代的斂孟,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市东南。又如在方国地望的考证中,他认为卜辞中的羌方应当就是后世称作的戎狄部族,等等,例证甚多,不胜枚举。钟氏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证,旨在进一步确定商王朝后期的领土范围和方国地望,这是近年来反映殷墟卜辞地理研究最新成果的一部著作。

以上所述几部著作,在整个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中,只是举其荦荦大端,其间所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已不下数十百篇,兹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备举了。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将近九十年来,学术界对殷墟卜辞地理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孙诒让《契文举例》的写就,到林泰辅《甲骨文地名考》的发表是其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学者们注意到卜辞所记的地名,把它们归纳为单独的一类,并运用文献资料考释其地望,从而为殷墟卜辞地理的研究开辟了先路,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开创阶段,奠基阶段。从郭沫若《卜辞通纂》的发表,到董作宾《殷历谱》的问世是其第二阶段,这个阶段郭沫若运用干支地名系联法,即首先依据卜辞地名之间的内在联系,再结合文献记载去探讨卜辞地名的地望,从而把卜辞地名的研究建立在一种新的科学基础之上,推动着卜辞地名的研究向着区域地理和商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方向转变,因此,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发展阶段。从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的问世,到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出版是其第三阶段,这个阶段陈梦家首次利用卜辞地名试图钩划出整个商代

历史地理的轮廓,它标志卜辞地名的研究正式步入商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阶段,这个时期既有继续研究单个卜辞地名的论文,又有专门研究卜辞区域地理的著作,更有专门研究卜辞商代地理的著作,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宏篇巨制,蔚为大观,因此,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卜辞地理研究的繁荣阶段。

但是,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随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意见分歧,当然,这些分歧的解决又会进一步推动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是科学研究发展的辩证法,各门学科率皆如此。学术界在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上的分歧,有些还是重大分歧,例如对商王主要田猎区的地望,如上所述,郭沫若、陈梦家以为当在今河南沁阳市地区,而董作宾、岛邦男则以为当在今山东省的泰山周围。二地相距,真可说是差之毫厘而别之千里了。那么,许多学者根据同样的卜辞资料,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却如此大相径庭,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对卜辞地名地望的认识不同,特别是对构成卜辞地名网络基本点的地名地望认识不同。众所周知,殷墟卜辞地名现已发现在千数以上,而许多学者对可以认识的多数地名地望的考证,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个地名的地望能达成共识的。由于对一些主要地名的地望意见不同,因此,由这些地名构成的地名网络所在地区也就不同。例如卜辞中的商地,罗振玉、王国维诸家以为当即今安阳殷墟,从而与商地有干支系联关系的许多地名也当位于今安阳市周围地区;而董作宾、陈梦家诸家则主张商即今河南省商丘县,那么与商地相系联的地名当然要位于今商丘县的周围了。显而易见,这里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对商地地望的认识不同。如此说来,要解决